

铁力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铁力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

1988·8

前 言

本辑发表的文史资料,时间跨度长(从清末到1949年建国前夕),记述的史实,既有正面,也有反面。铁力县各族人民和全省各地一样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。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,在抗击外来侵略、解放战争、土地改革的熠熠伟业中,同样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。本书对剿匪建政、土地改革、文化教育、宗教情况,以及旧社会的公害等方面的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,这对于了解铁力县某一个历史侧面,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以及弥补文献、档案之不足,搞好精神文明建设,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我们在征集本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,博得一些老同志的热心支持,积极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稿件,有的暂没辑入本书,余者待后陆续编发,在此作以说明,并深表谢意。

编 者

1988年8月

10 13

目 录

1. 在铁力县剿匪建政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唐光裕 (1)
2. 铁力县土地改革运动概况……………傅宪庭 赵文清 (23)
3. 昔日的铁力教育……………关明哲 (44)
4. 铁力县的佛教道教基督教概况……………方永和 (56)
5. “八一五”前后铁力政局……………张殿安 (73)
6. 日本飞机轰炸铁力镇……………徐辅庆 赵文清 (78)
7. 旧社会三大公害……………刘永厚 赵文清 张殿安
关明哲 张 旭 (81)
8. 投敌变节的周洪山……………崔云龙 姜秀兰 白淑兰 (91)
9. 血债累累的汉奸李秉衡
……………崔云龙 姜秀兰 白淑兰 (94)
10. 惯匪“黑龙”、“五洲”被歼记
……………崔云龙 姜秀兰 白淑兰 (97)
11. 铁力县名考述……………赵文清 (101)
- ✓ 全国道教协会理事、85岁高龄刘明哲道长近照
12. 《道德经》解……………刘明哲 (110)
13. 《阴符经》解……………刘明哲 (143)

在铁力县剿匪建政的日子里

唐 光 裕

1945年11月，按照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，我们山东莱芜等县的地方干部七百多人，编成了七个连队，随胶东第三师一起开赴东北。东北局分配我们到北满参加剿匪建政斗争。

接受新任务

1946年2月下旬，龙江省委组织部找我和孙兆鸿同志谈话，要我们到绥化地区的铁力县去做接收，改造伪政权和建立人民政府的工作。铁力县是绥化地区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。周围各县都已建立了人民政权，只有铁力县还没有干部去接收，暂由庆安县代管。与我们同去执行这一任务的还有徐柏生同志，他已经先走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揣着省委的介绍信，背着

背包向火车站走去。二月的北安(当时的龙江省省会),还是滴水成冰的寒冷季节,北风从棉袄袖筒里一个劲地往里灌。由于当时生活艰苦,我们从山东过来的地方干部,都没有发衬衣衬裤,穿的是空心棉袄棉裤,冷风钻进来,身上冻得直起鸡皮疙瘩。背包更是简单,就是一床被子。那个时候的火车,没有固定的到停时间,我们怕赶不上火车,尽量加快脚步。火车厢里,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,被旧的车体一走“哐啷、哐啷”直响,寒风从被碎的车窗和地板缝里钻进来,火车走走停停。我透过车窗,望着冰封大地,满目荒凉,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造成的疮痍,随处可见,天际下萧索的荒村,很少见到几缕炊烟。沿途上下火车的贫苦群众,穿得破破烂烂,满脸愁容。

傍晚,火车到了绥化。地委给换了介绍信,叫我们先到庆安了解一下情况,再到铁力去。

庆安县委设在县城的大兴当,那里有一个院落,四周是围墙。我们找到县长赵树森,他正忙得不可开交。晚上,才有了一点空闲,把他所掌握的情况向我们做了详细地介绍,他说:“日

本侵略者投降之后，绥化地委派尹东征、刘之远、王可凤等同志，带一百人左右的部队，接收了庆安县，由尹东征同志任县长。原庆安县伪县长刘绪宗和伪县大队长国常有串通一气，收拢了汤原、东兴、铁力、庆安一带伪警察、消防队、森林警察及一些地痞恶棍，拉起了土匪队伍。匪首除国常有外，还有于振江（匪名叫黑龙）、王忠清（匪名叫五洲）、林警佐、孙毛子等。他们联合起来，抗拒我党接收。于1945年9月，匪首国常有、“黑龙”、“五洲”带三百多土匪进犯我庆安县城。当时，尹东征等县委领导同志率部队住在大兴当内，县政府仍在伪县公署原地办公，那里住的多是留用人员，没有部队警卫。匪徒迅速地占据了县政府，又将大兴当四面包围起来。警卫大兴当的部队只有一百人左右，面对三倍于我的土匪，战士们打得很顽强，土匪的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了，激战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。情况很紧急，直到绥化地委派来援兵，土匪们才逃走了。

后来，我们经过一番工作，收编了国常有、“黑龙”、“五洲”等人的土匪队伍，为了稳定他

们，将其改编为龙江军区警卫营，但国常有、“黑龙”、“五洲”等匪性不改，不服从指挥，不听调遣，对我党总是耿耿于怀，一直阴谋策划，寻机反叛。1946年1月，省军区确定要缴他们的械，省军区参谋长周伟和庆安县委进行了周密的部署。这一天，通知国常有、“黑龙”、“五洲”带所有排以上干部，到庆安县委听军区副司令员于天放讲话，“黑龙”、“五洲”心中有鬼，对国常有说，开会没好事，我们不去，你是营长代替我们了，要问就说我俩有病了。黑结果“龙”、“五洲”没有来。国常有来了后，被让到政委办公室，连排长都进会场去了。国常有在办公室里抽烟、喝水、周参谋长和杨子荣陪着说话。在会场里连排长们，一看按通知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一个连长嘴里骂骂咧咧地带他们的人就要走。这时，早已布置好的两个连队，在岱政委的带领下，堵住了一切出口，当场宣布了缴械的命令，那个连长刚要动手，立即被岱政委击毙，其他人都被缴了械。国常有听到会场里枪响，站起来就要往外走，周参谋长说，今天你走不了啦！杨子荣迅速把国常有的枪下下来，国常有被抓获了，“黑

龙”、“五洲”发觉形势不妙，拉起土匪很快上了山。不久，匪首国常有被处决。

1945年末，尹东征同志派四连（就地刚组建起来的）连长带10个人到铁力县去接收的，当时铁力镇的秩序混乱，土匪经常出没于镇内外。匪首林警佐、孙毛子的家就在铁力镇内。每天晚上都可听到枪声。1946年初，尹县长到铁力，将四连改编为铁力县大队，由一名留用的职员任大队长。尹县长调走后，庆安县委派留用人员李大光等7人到铁力，成立了铁力县佐办事处；由李大光任县佐，方永和任秘书。并告知前几天省委已派徐柏生同志去铁力了。

上 任

3月6日，我和孙兆鸿到达铁力。赵县长还给我们派两名干部来协助我们，都是国高毕业的学生，家也都住在铁力县，一个叫温洪志，另一个叫何永达。车站离县政府六里路，小温和小何扛着行李先走了。我和孙兆鸿下车后，一边走一边察看铁力镇的情况，并想找几个老百姓聊聊。在街上，遇到一个赶马车的，他看到我们的

装束，慌慌张张地说了几句就走了。又遇到几个老百姓，我们刚要上前搭话，他们也都赶忙躲开了。

到了县佐办事处，只见二十几个人的欢迎队伍，站在门两旁，在鼓掌欢迎我们。其中有一个和我们装束差不多的二十六七岁的英俊青年，不用说就是徐柏生同志了。徐柏生把县佐李大光、方永和等留用人员——给我们作了介绍。

晚上，我们和孙兆鸿、徐柏生三个人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，确定成立铁力县党支部。他俩推举我当党支部书记。第一次支部会研究的中心议题是：如何改造铁力县，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。我们分了工，徐柏生同志是四川人，那年才26岁，学生出身，文化水平比我们高，在我们三个人中，他算是秀才了，在部队里是师里的营职宣传干事。他很能打仗，也有丰富的斗争经验，所以分工他管政府那一摊。孙兆鸿同志25岁，在山东搞过武工队，分工他抓武装工作，负责县大队。我那年23岁，在山东时主要搞群众工作，分工负责组织，发动群众。

第二天，我们接收了县大队，先把武装抓到

手。县政府的接收工作开始后，我们普遍找伪政府职员谈了一次话，讲我们党的政策，使其安下心来，好好进行改造，跟上时代的步伐，为广大群众服好务。徐柏生同志按照原伪政府中的分工，让各科的科长分管财经、粮食、林业、交通和社会秩序等项业务工作。农村工作一时间还顾及不上。

我们虽然接收了县政府和县大队，但是铁力县的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，土匪在县城周围经常出没，县大队的成份也很复杂，有的和土匪有联系。所以，我们3个人格外谨慎。县政府是个四合院，大门在南边，院外四周有围墙，左厢房是厨房和马厩，北面和右厢房是办公的地方，县大队住在靠大门的左侧。四合院的中间有一个防火瞭望楼子，底部是个空屋，砖墙很厚，窗户也不大，上边安着铁筋。我们就把住宿的地方选择在空屋子里，搬进去两箱手榴弹，如遭到土匪袭击时，瞭望楼就可以当成工事。睡觉的时候，县大队在门口给我们站岗，我们三个人，加上徐柏生新找的警卫员陈家骥，晚间在屋里轮流值宿，随时都有应付发生突然事变的准备。

来铁力还不到一个星期，一天夜里，我在屋里值宿，发现门口站岗的士兵不见了，枪和子弹放在墙根。我到门外，把枪和子弹拣起来，到县大队找排长。县大队共两个屋，外面大屋是士兵住的，里面小屋是大队长和排长住的。大队长每天晚上回家睡觉，排长每天在队部值宿。我看排长的屋里还亮着灯，便舔破窗户纸往里一看，屋里一个排长光着膀子，一个妓女陪伴着，在抽大烟，手枪放在大烟盘子边上。我一看他那个架势，没有惊动他，把枪和子弹袋轻轻地放到县大队门口。回到住处，我更不放心了，眼睛盯着大门口，耳边听着四周的动静，这时候真正站岗的就是我了。

天快亮了，那个排长出来解手，一看枪和子弹袋放在门口，人不见了，只听他骂了几句，又叫出一个当兵的，算是把岗站上了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那个排长也不辞而别了。对于这样一支武装，我们是不放心的。孙兆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，把那些实在不象样的，清理出县大队，吸收进一些工人、农民，逐渐改善了县大队的成份。三个月之后，县大队发展到五十多人，我们3个

人才不用在屋内轮流值宿了。

发 动 群 众

为了站稳脚跟，我们把开辟铁力县的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。铁力镇当时只有八千多人，工人队伍大部分在林业、铁路系统，还有一个较大的制材厂，其它就是一些商业和小手工业者。党支部经过研究，决定先从铁路入手，打开局面。

我来到火车站，走进一个工作间，里面的工作人员穿戴都很讲究，他们看我进去，都站起来，谦恭地点着头。开始我感到很奇怪，怎么一见到我，都齐刷刷地站起来？一转念，我就明白了，大概是从我的着装上发现我是共产党的干部。那天我戴着机关里发的白毡帽，穿着东北局发的过膝盖的蓝棉袄，打着裹腿，腰间扎着皮带，本地人是没有这样着装的。另外，我们到铁力县的消息，传得很快，也很玄乎，说共产党来了好几百人，已经接收了。他们估计我可能就是共产党。我问他们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他们回答：“这是工务段”。我从这些

人的打扮上，感到他们还不是最可靠的基本群众，说了几句你们好好工作，维护好铁路秩序之类的话，就出来了。

离工务段不太远的地方，在一座小矮房，门口挂着个“非班”的牌子。我弯腰走进去，看到二十几个人正围着火炉烤苞米面大饼子，窝窝头吃。这些人都穿着破衣烂衫，其中四五个人屁股上围着麻袋片，他们看我进去，都扭过头来看我，一个个黝黑的脸，眼睛里流露出惊喜的神色，听说话口音，都是山东、河北人。他们围过来悄声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八路军，过来多少人？”我说：“是呀！”我问他们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”他们回答是干非班的。我又问：“什么叫非班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非班就是什么活累，什么活脏，什么活别人不愿干，挣钱还少，就是非班。”他们又问：“你们不是为穷人办事的吗？”我回答：“是啊”。我给他们讲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，是为了工人、农民和一切受压迫的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党。当时，就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给他们讲，现在就是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，我们就是搞这个的。

一个四十来岁胖墩墩的工人说：“那太好了，你们能不能领导我们，给我们撑腰出气呀？”别的工人告诉我，他是我们非班的班长，叫杨德林。我回答说：“能呀，你们有什么冤，有什么仇就说吧。”接着，杨德林等工人满腔气愤地摆开了铁力车站站长刘永昌的罪恶。

刘永昌是伪满高级职员衔，“八·一五”后又参加了当地的国民党部。本来祖国光复了，人人都高兴，而他仍然同日本人串通一气，百般讨好日本人。他对铁路职工都非常刻薄，经常打骂工人，还向工人“勒太脖子”，每年过年过节，叫所有的工人给他通礼。五月节，还向杨德林要一斗黄米，五斤鲶鱼。不送礼就找你毛病，把许多工人勒得喘不过气来。他往自己的腰包里搂了好多钱，日军刚投降那阵子，铁路秩序混乱，没有车票，他就弄个白纸条，盖上他的手戳当车票卖，钱都进了他的腰包。三个月不给发工钱，激起了铁路工人的极大愤恨。在1945年11月，车站工人集中起来，同他进行说理斗争，但被伪铁路警察和特务张德力给镇压了。这次斗争失败了，还有一些工人被停薪。但工人们心中不服，他们

说：“正好你们来了，请你们给工人作主报仇吧！”。

这些工人听我的口音是山东人，就聊起家乡的事，向我打听关里解放区和八路军的情况，我们越聊越热乎。最后，杨德林邀请我晚间到他家去，我欣然答应了。杨德林一家五口人，挤住在一间工房里，门口接出个小偏厦当厨房。生活很是艰难。头一天晚上，在他家就召集了二十多人。没过一个星期，非班的工人又串联了一百多人。晚间在杨德林家听我讲党的政策，宣传翻身求解放的道理，发动大家一条一条地揭露站长刘永昌的罪行。当时，天气还很冷，这么多人在一间小屋里哪能容得下，有些人从家里拿个小板凳，揣着手坐在屋外的风雪地里，认真地听我讲话。我被工人群众翻身求解放的真挚感情所鼓舞。穷苦工人怕我遭到暗算，每天晚上往回走时，他们都出动七八个人，扛着扎枪，把我护送回县政府。

当时，徐柏生、孙兆鸿和我，每天晚间到一块，都要各自汇报一下当天的工作，研究第二天的任务。到铁力县40天后，我提出建议，现在铁

路工人已经动员起来了，为了推动面上的工作，应该开个斗争会，把刘永昌斗争一下，煞煞铁力县的恶势力。徐柏生同志仔细地分析了此时开斗争会的利弊关系。我们经过再三研究，为了尽快打开局面，确定开好这个斗争会。

我把铁力县党支部的决定告诉了杨德林，一批积极分子们就着手进行准备。开斗争会这天，铁路组织了一百多名工人，把刘永昌绑了，从车站押往西门里的一个大空场上。象在关里斗地主那样。铁力镇的群众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从车站到广场的三里路上，跟来上千人，大街上贴了许多标语，广场上搭起了台子，上面还写着横标。开始，刘永昌对我们斗争他的情况估计不足，在押往广场的路上，他还趾高气扬，满不在乎。上台后，叫他低头。徐柏生首先代表人民政府讲了话，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的宗旨。接着便是铁路工人的控诉。刘永昌在大量证据面前，吓得大汗淋漓，不得不低头认罪。这次会开得很成功，不仅铁路工人扬眉吐气，更加信任党和人民政府，就是没来参加斗争会的群众，也受到了斗争的鼓舞。在广场上参加斗争

会的群众达两千人左右,这也是我们到铁力县第一次公开亮相,在这样大的范围向人民群众直接做宣传。斗争会的情况,又通过参加会的人传到林区和农村,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设想。后来,铁路工人推选出自己的站长,来管理车站的工作。

过了不久,有些群众主动找上门,要求人民政府做主,斗争他们所在的林场、农村的恶霸。特别是林业工人强烈控告把头盘剥的罪行。我们经过核实后,枪毙了几个罪恶大的把头,多年来压在工人群众心头的石头被掀掉了,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逐渐高涨起来。

正如我们所预料的,斗争会后,镇里一些有民愤的人,跑到乡下去躲了起来。为了稳定人心,我们又采取了一些措施,组成农会组织,分成四个组到镇内几条街上去宣传党的政策,明确提出:我们只斗争那些罪恶大、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的、欺压老百姓的人;对那些罪恶小,有悔过表现,拥护人民政府的人,不进行斗争。这样,跑到乡下去的人也陆续回来了一些。在此期间,有些伪职员不愿留下干的,自动退职回